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从西周金文材料看先秦时期的战争原因

商艳涛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战争是西周金文中的重要内容,战争发生的原因很多,总体看来,可分为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又可分为夺权建国、平叛拓疆、御敌入侵等多个方面,西周早、中期战事爆发原因以夺权建国、平叛拓疆为主,御敌入侵的战事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经济上争夺贡赋和劳力也是发生战事的又一重要原因。

关键词: 西周金文; 战争原因; 政治; 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4-0108-06

先秦时期社会多处于动荡之中,大小战事频繁,当时战事发生的准确次数已难以统计,仅西周金文中直接关涉战争的就有七十余篇。从内容来看,这些战争发生的原因、目的有多种,主要有夺权建国、平叛拓疆、御敌入侵以及掠夺经济资源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

一

典型以夺权建国为目的的战事当属武王灭商之役,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是西周史上的头等大事,而且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对此在西周金文中有多处记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武王时期的利簋铭: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1]287①。

该铭文较为完整地记载了武王灭商的时间、经过,在武王征伐殷商的甲子日这一天早上,周人进行了岁祭和占卜,占卜的结果显示能够战胜对方。后来果然只在一天中就打败了对手,占据了殷商都城。

除利簋外,其他多篇铭文也涉及到了这一事件,如: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何尊)[2]275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宜侯矢簋)[1]452

讯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永丕巩狄;虐,彭伐夷童。(墙盘)[3]132

传世的先秦文献对武王伐纣也多有所载,可以和金文材料互证,典型者如: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尚书·牧誓》)[4]1091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5]374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夫恶臣百人。(《逸周书·世俘》)[6]414-415

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吕氏春秋·仲秋

收稿日期:2008-07-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7JC740013)

作者简介:商艳涛(1972—),男,河北保定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训诂学.

① 本文所引释文采用宽式隶定,一般使用通用字,为排印方便,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个别文字使用形近字替代。

纪·简选》)[7]446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8]325

此外，《荀子》、《墨子》、《淮南子》、《说苑》、《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也都有相关的记载。利簋铭中伐商时之“甲子”与《尚书》等文献所记时日正合，足见金文中对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应当是可靠的。

殷商灭亡的原因，西周早期大盂鼎铭所言在于“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9]410，《史记·周本记》也说“纣昏乱暴虐滋甚”[10]57，殷商无道固然是导致灭亡的一个重要缘由，但周族不断发展强大，不甘于受人统治，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则是更主要的原因。周人伐商就在于要彻底推翻其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因而灭国夺取政权就成为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

二

西周建立之初，叛乱多有发生，周统治者为了平定叛乱并进一步拓展疆土而发动了多次战事，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中期，有多篇金文记载此类内容。金文中多用“反”字表明战争因叛乱而起的，如：

唯公大保来伐反夷年。(旅鼎)[9]331

王令遣捷东反夷。(寰鼎)[9]332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9]341-342

过伯从王伐反荊。(过伯簋)[1]196

王伐录子听，咥！厥反。(大保簋)[1]292

咥！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小臣逋簋)[1]358-359

从时间上来看，上述反叛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周中期都有发生，反叛者多为东夷诸族，间有南地的虎方、荆楚，这种情况是与西周前期的史实相一致的。山东一带为殷商旧族所居之地，其与当地的东夷诸族关系密切，王国维、丁山、徐中舒等人均主张商族源于东方[11]165-167，在山东一带的田野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殷人早期活动的遗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商族很可能即源于东方。武王在伐纣灭商之后，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马上对居于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采取军事措施，殷商遗民仍由纣子武庚管理，武王只是封其弟管叔、蔡叔以采邑，进行监视。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遗民。武王以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10]59《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6]510-511而当武王过早去世之后，成王即位，由周公辅佐。管叔、蔡叔对周公当国不满，于是勾结武庚，联合东方的殷商旧势力，乘机发动叛乱。周公率军东征，平定了管蔡的“三监之乱”，对于这段历史很多文献也都有记述：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逸周书·作雒》)[6]516-518

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没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尚书大传》)[12]176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尚书大传》)[12]240-241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

而毕定。(《史记·周本纪》)[10]61

金文中反映这段历史的,除去上举大保簋铭之外,尚有以下诸篇:

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小臣单觶)[2]351

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于卫,沫司徒疑眔啚作厥考尊彝。(沫司徒疑簋)[1]257

小臣单觶、沫司土疑簋二器时代诸家多考订属西周早期成王时期,铭文所记当为成王二次伐商时事,从内容来看,与周公平叛、东征同时,应与武庚叛乱有关,"商"、"商邑"当指殷遗武庚盘踞之地。

成王时期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周公继续东征,彻底消灭了殷商的残余势力,拓展了疆土,巩固了在东部地区的统治,反映这一史实的有如下铭文:

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咸劓。(坍方鼎)[9]335

王伐奄侯,周公某禽祝,禽又敃祝。(禽簋)[1]249

王征奄。(冈劫卣、冈劫尊)[2]142

以上金文可与文献相印证,《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8]155《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13]482《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毕沅注:"商盖即商奄。"[14]644金文中的"奄侯"、"薄姑"当即上引文献之奄与薄姑。在周公征东夷翦灭商奄、薄姑之后,于是分封齐、鲁等国,借以镇抚东夷,周人势力延伸到东部地区,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面。另外,文献只言成王即位尚年少,由周公摄政,平叛东征皆是周公一人所为,今以上举小臣单觶、沫司徒疑簋及伐奄之坍方鼎、禽簋铭观之,知成王亦亲自参与了伐商与东征。

成王之后,东夷地区叛乱仍是时有发生,并且一直持续到中期穆王时,相关金文如上所举成康之际的旅鼎、康昭之际的寰鼎铭,更为严重的要属穆王时期的小臣速簋、班簋铭所载的叛乱:

嗟!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小臣速簋)[1]358

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铁人伐东国偃戎……三年静东国,亡不成尤。(班簋)[1]479

从铭文中"大反"、"三年静东国"可以反映出当时发生叛乱的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

穆王时期东夷反叛事也见于文献,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周缪(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10]80-81。伐徐又见于《赵世家》及《后汉书·东夷传》。又《太平御览》卷305征伐部引《竹书纪年》:"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纡,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比黿以为梁。"文中"纡"当为"纾"之误,而"纾"、"舒"通用,"舒"、"徐"古字通,是穆王伐纡即伐徐[15]52-53。虽然徐偃王不一定与穆王同时,但从这一记载上仍能反映出穆王时期东夷地区并非太平无事,这也由小臣速簋、班簋铭得到了证实。

由此看来,从西周早期成王一直到中期穆王时,东夷对周王朝态度变化无常,叛乱时有发生,而且规模很大,周王、周公亲自出征才得以平定。

昭王时曾南征虎方、荆楚等国,虎方地处周之南,大约地处汉水流域。除去上举中方鼎、过伯簋铭之外,与征楚相关的铭文尚有:

鼐从王伐荆,俘。(鼐簋)[1]145

鸿叔从王南征,唯归,唯八月,在荼居。(鸿叔鼎)[9]288

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鸿叔簋)[1]208

狳驭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狳驭簋)[1]219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令簋)[1]426

唯王南征,在□。(小子生尊)[1]267

宏鲁昭王，广笞楚荆，唯贯南行。（墙盘）[3]132

用会邵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逑盘）[16]32

以上伐楚荆大概都发生在昭王时期，昭王南征又见于《竹书纪年》、《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但是并未记载楚国作乱，金文中所谓“反”或与楚荆不向周提供铜料有关，似非一般意义上的叛乱，昭王南征荆楚其目的当是掠夺铜矿资源。

三

记载外敌入侵的金文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晚期，尤以晚期为甚，入侵之敌也主要是南方的淮夷和北方的猃狁，如：

唯十又二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敍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謹，不悉，广伐东国。（史密簋）[17]375

唯戎大出[于]軝，井侯搏戎。（臣谏簋）[1]358

南国濮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胡钟）[18]226

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9]403

唯十月，用猃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多友鼎）[9]406

驭方猃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汝御追于略。（不其簋）[1]463-464

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豕师，侯扬王于兹。（晋侯铜人）[19]417

从形式上看，这类铭文记事脉络都很清晰，一般先言外敌入侵，然后再说周进行抵御，原因结果表述得非常清楚。也有先言结果再交代原因的，如上引史密簋铭“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敍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謹，不悉，广伐东国”，文中“会”有适逢、适值义，《诗经·大雅·生民》“会伐平林”朱熹集传：“会，值也。”[20]191

与猃狁的战事除上举多友鼎、不其簋铭外，尚有以下几篇：

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虢季子白盘）[3]130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猃狁于彭衙，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兮甲盘）[3]131

汝唯克弗乃先祖考闢猃狁，出捷于井阿、于历岩。汝不艮戎，汝□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汝执讯获馘，俘器车马。（四十二年逑鼎）[16]16

从时间来看，南淮夷、猃狁等外族入侵集中在晚期厉王、宣王时期，这也正是西周的衰落期。西周王朝自昭王时已经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懿王以后国势渐衰，据《史记·周本记》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10]63另据《汉书·匈奴传》：“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21]1624至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政治混乱，《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者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22]9《荀子·成相》：“上壅蔽，失辅埶，任用谗夫不能制。郭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23]995正是由于厉王时期国势衰微，才引起外族不断入侵，据《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15]57厉王时器胡钟、禹鼎、多友鼎铭所记外族入侵之事正可与之相印证。另外，西周晚期的虢仲盨盖铭

也记有“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1]505,虢仲南征伐南淮夷事见于《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侵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24]1230二者所记当为同一事,亦为抵御外族入侵之役。西周晚期与猃狁之间战事也见于《诗经·小雅》中《采薇》、《出车》、《六月》、《采芑》诸篇,其时代大致在西周宣王时,可与铭文互证。

四

铭文中引发战争的原因除去政治方面之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战争“征服的结果要求治理被征服的人民和地区”[25]61,被征服者要政治上臣服,经济上提供贡赋和劳力,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正有此类记载:

(王)令甲征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贾,则亦刑。[3]131

从铭文内容可以看出,南淮夷要向周提供“积”,而且一直以来就有向西周纳贡的义务,负责提供“帛贿”、“积”、“进人”,郭沫若认为“帛贿人”指贡赋之臣[26]144。李学勤指出“积”即“委积”,孙诒让《周礼·大司徒》注“凡储聚禾米薪刍之属通谓之委积”,即军队粮草之类。“进人”,“进”为“纳入”,“进人”即向周王朝提供服役的人[27]138。“次”指军队驻扎处,“市”指集市。由此看来,淮夷不仅要向周王朝提供布帛等贡赋,而且还要负责输送粮草和劳力,同时其商贾还要到军队驻扎地和集市进行贸易,否则,周朝就会“即刑扑伐”,即用军队进行征伐。

同时期的师袁簋铭文正好提供了与兮甲盘铭相关的内容:

王若曰:师袁,或,淮夷旧我帛贿臣,今敢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迹我东国,今余肇令汝率齐师、纪、莱、棘,殿左右虎臣征淮夷……师袁虔不坠,夙夜恤厥将事,休既有工,折首执讯无计,徒驭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1]441

铭文中交代周伐淮夷的原因是“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速我东国”。郭沫若以为“博厥众叚”谓“迫其众使暇”,“反厥工吏”谓“背叛王官”[26]146。“速”同“迹”,“弗迹”即“不迹”,《诗经·小雅·沔水》“念彼不迹”毛传:“不迹,不循道也。”[28]202“弗速我东国”指淮夷的叛变使我东国出现了不循王道的事。此铭与兮甲盘内容相类,二者互参更能全面理解周伐淮夷的原因。兮甲盘铭中明确交代淮夷对周朝的义务是“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师袁簋铭“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速我东国”正与之相对应,“博厥众叚”针对指“帛”而言,指提供帛贿的奴隶闲暇下来不事劳作,“反厥工吏”指使为周服务的工吏返回,“弗速我东国”是说不再向东国提供粮草委积,这里“迹”或可读如兮甲盘铭中的“积”。正是因为淮夷不再为周提供这些物资,因而招致周军队的大肆“扑伐”。周师征伐的目的主要在于恢复原来的统治秩序,使淮夷继续臣属于周,向其交纳贡赋,提供贸易服务。

与此内容相关的还有同时期的驹父盨盖铭: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堇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无敢不□具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作旅盨,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1]523

据李学勤考证,该铭所记可能发生在征伐淮夷刚结束之后,一方面要安抚被侵扰的诸侯国,另一方面趁机会对南淮夷各国进行掠夺。“厥取厥服”、“厥献厥服”之“服”据黄盛璋研究认为即《周礼·大行人》中的“服物”,指布帛之类,孙诒让曾论及服贡不是贡成服,而是制作衣服的材料。这里向南淮夷征取的仍然是兮甲盘铭中提及的“帛晦”之类,可见,这正是周朝对淮夷用兵的一个重要目的[27]138-145。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三卷[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4] 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高　亨. 诗经今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 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 吕不韦. 吕氏春秋新校释(上册)[M]. 陈奇猷，校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杨伯峻. 孟子译注(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10] 司马迁. 史记新注(一)[M]. 张大可，注释.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11]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黄中业，编著. 三代纪事本末[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13] 韩　非. 韩非子新校注(上册)[M]. 陈奇猷，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 吴毓江. 墨子校注(下册)[M]. 孙启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 方诗铭，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J]. 文物，2003，(6).
[17] 刘　雨，卢　岩，编著. 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19] 上海博物馆，编.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20] 朱　熹. 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1] 班　固. 汉书(下册)[M]. 陈焕良，曾宪礼，标点. 长沙：岳麓书社，1993.
[22]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3] 荀　况. 荀子校释(下册)[M]. 王天海，校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4] 范　晔. 后汉书(下册)[M]. 陈焕良，李传书，标点. 长沙：岳麓书社，1994.
[25]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6]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7] 李学勤. 新出青铜器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8]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K].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War Reason 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West Zhou doynasty

SHANG Yan-tao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Military bronze inscription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West Zhou dynasty, and the war reasons are complex,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politicial reason and econommic reasons accoding to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reasons are analysised with documents.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of West Zhou dynasty; war reason; politics; economy